

杨 匏 安： 将 信 仰 的 诗 文 融 入 生 命

□ 叶介甫

杨匏安，1896年11月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受派到国民党中任职，致力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9年，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党报。他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借次清霜坚傲骨”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那时，杨匏安的家乡周边驻扎着一营清政府的新军。在同盟会党人的策动下，这营新军宣布起义，光复了香山县城。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军阀袁世凯篡夺了。接着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又告失败。袁世凯的爪牙、云南军阀龙济光占据了广东。他的土匪队伍“济军”，进驻香山，到处贩烟开赌，加捐增税，无恶不作。血气方刚的杨匏安，目击着一幕幕政治风云的激变，想到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祖国，水秀山清的家乡，依然是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维新变法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苦心缔造的民主共和国也名存实亡。“霸气已沉文物改，云流垂尽管弦凄”。杨匏安不禁情绪低沉，徘徊苦思，祖国的出路在哪里？包括自己在内的年青一代的出路在哪里？他彷徨、苦闷，难以找到答案。

1915年，他东渡日本横滨求学，其间接触到西方各种流派学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次年杨匏安回到家乡，后在澳门当家庭教师。1918年初，杨匏安举家迁到广州，起初，他在时敏中学担任国文老师，教学生写诗作文，提出关于诗文内容与形式的两项标准：“义取本务实，辞唯绝俗清高”。又说：“诗文一道，首贵无俗气。然欲诗文之无俗气者，必其人先无俗气，外欲其人之无俗气者，则举凡流俗所趋之事，非斥去不可。”

当时，广州警察局的一位官僚，请他去当幕僚。对这个“肥缺”，杨匏安断然拒绝了。虽然中学教员的薪水不高，但他宁可清贫度日。他写过一首诗《钓》：

收拾诗篇理钓竿，潺湲秋水辨微寒。

居夷有此宁为陋，合轍于今倍觉难。

霜叶争霞明水际，风帆向晓走云端。

单檐皂帽萧条甚，老却天涯管幼安。

在诗中，杨匏安以东汉末年的隐士管宁自喻，表达了自己即便身处恶浊的环境中也不决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而宁愿安贫乐道、淡泊自甘的高洁志趣。

然而，杨匏安这时的心情，却是沉重而忧郁的。除了生活的坎坷成为他的心头重压，国事的混乱也使他感到窒息。先是1917年的夏天，辫帅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复辟，虽然不过是为时11天的插曲，但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却留下了很深的暗影。同年9月，孙中山带领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不到一年，又被西南军阀逼走上海。南北军阀连年混战，只苦了老百姓，长年陷于火海血泊之中。缅怀家国，千头万绪，心情复杂的杨匏安写下了《消夏》：

春衣典尽觉身轻，日日江头着履行。

不作词人妨感喟，偶同渔父话虚盈。

人闲只合看云坐，世乱聊为带雨耕。

我已无心问哀乐，残蝉何事倚高鸣？！

诗中流露了“世乱聊为带雨耕”“我已无心问哀乐”的由愤世到避世的思想，这同他当时还找不到革命的出路有关。

但是，杨匏安毕竟是一个不愿自我消沉、不甘长此颓唐的人。他不会在祖国陆沉、人民受难的时候袖手旁观。后来，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他的诗中更多是积极向上的元素。如《秋夜同无庵闲步》：

拂面西风病乍起，柳堤行尽履声孤。

大江潮涌初圆月，浅渚秋惊熟睡凫。

借次清霜坚傲骨，拼将浊酒斗羸躯。

多时不作还乡梦，旧种黄花尚有无？

在这首诗中，他通过“借次清霜坚傲骨”，赞美秋菊冬梅勇斗霜雪的精神，表达自己不畏强暴、投身斗争的信念和决心。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1928年春，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在上海组织革命文艺团体“太

阳社”，杨匏安参加了成立大会，后用笔名“太阳社”写过小说。其后，杨匏安被派赴南洋，在新加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做党的工作。

当时，他曾寄回两首诗，被亲友保存下来。其一题为《十一月既望泊舟星架坡港》，诗云：

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

徐日可消行坐卧，感怀休问去来今。

江南有梦迷蛮瘴，海外何人辨雅音？

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

另一首题为《寄小梅》：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境，问禁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枕前。

在“漏刃投荒”，流亡异国的时候，杨匏安仍念念不忘“公忠不可忘”。杨匏安一家，则先后移居澳门、香港和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作为地下机关，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并参与编辑党的刊物。他的家人则分散住在党的出版机关、交通机关。不久，由于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这时，周恩来冒着危险时常去看望杨匏安的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杨匏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被敌人囚禁8个月后即获释放。出狱后，他仍留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杨匏安和阮啸仙一起，以中国互济会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训练党的各级干部。

杨匏安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还进行翻译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7月，他化名“王纯一”，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深刻剖析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通过地租剥削的实质，成为日后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杨匏安还编译了一本3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系统扼要地叙述了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主要著作，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论。这是一本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西洋史著作，也是在当时颇为难得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书。杨匏安编译的这两本书，都由共产党员林伯修主持的上海南强书局出

版，其中《西洋史要》一书，杨匏安牺牲之后仍在刊行。

1931年春，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罗绮园因行为不检，被人揭发向蒋介石告密，牵连杨匏安等10多人一起被捕。杨匏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杨匏安撕毁，蒋介石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也被杨匏安摔掉话筒。在狱中，杨匏安托人带出了一封给亲属的信，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成功。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夺囚车。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杨匏安的命令。

杨匏安与罗绮园共事多年，关系密切。狱中的杨匏安觉察到罗绮园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威迫，有动摇变节的可能。为了争取罗绮园，杨匏安在牺牲之前，作《死前一夕作·示难友》一诗，给罗绮园并告别难友。诗曰：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退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诗中所说的张俭是东汉名士，汉献帝时，百姓遭遇饥荒，张俭用尽全部财产，救活了数百人。褚渊，南北朝人，宋明帝很信任他，尝谓：“褚渊能退行缓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宋明帝临死，封之为中书令，使与袁粲共理国事。不料褚渊却出卖袁粲，助齐篡宋。人们讥讽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杨匏安这首诗，意在告诫罗绮园并勉励难友，坚持斗争，保全气节，不可像出卖灵魂的叛徒褚渊那样，永为世人耻笑。这首绝命诗，充分体现了杨匏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崇高气节。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用这首诗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匏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1931年8月，杨匏安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杀害，年仅35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革命事迹和不朽诗文，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摘自2019年8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将信仰的诗文融入生命》）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看到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可他又有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摘自2015年第9期《中华魂》，原标题为《毛泽东延安时期的三个小故事》）

中共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的党员教育活动

□ 郑学富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专题报告。

报告概述了我党自建立以来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比较了中共与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同传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遭到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我党重新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并号召我党要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却承袭了中国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报告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

毛泽东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 朱冬生



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

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是“不认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人的工作”“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但报告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

当时，在延安的一大批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摘自2019年6月25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关于“七一”的五个第一》）



1947年3月5日，担任朱老总秘书的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那里谈话。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的窑洞，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谈话，让我等一等。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我进了少奇的窑洞，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少奇给我讲了很多道理。

回忆我和少奇相识结婚

□ 王光美

空上我那儿玩。”

有了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领导请假说要去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说，我有事要去西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赖祖烈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对我的好感，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一般人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他却光说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

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

少奇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触动了一下。我想：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我就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说：“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不久，我就托人把表修好，请我的领导王炳南转交给了少奇。

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人，后来我还真的去了。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上来就交代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

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过了一段，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儿，算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1948年8月21日，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来帮我搬行李。这天，外事组的同志们还做了一个大蛋糕，也一起带

到了少奇那里。

正好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毛主席、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几位女同志和我到另外一间屋切蛋糕。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每人切了一份。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举行什么仪式；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摘自2016年第6期《新湘评论》）

